

杜清持与近代广州女子教育*

——从最新发现的史料说起

黄湘金

提 要：杜清持以笔名“移风女士”发表的《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》是研究近代广州女子教育的重要史料。以此为基础，结合其他资料，可以厘清杜氏投身于女学事业的经历。作者对移风女学校、“广东女学堂”、公益女学校、坤维女学校、公益女子师范学校的历史进行考辨，补充了广州地方史著记载之不足，初步呈现清末民初广州的女子教育生态。

关键词：杜清持 《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》 广州女子教育

一 杜清持自述之发现

论及近代中国的社会化女子教育，广州是不能不谈的重镇。由于位列通商口岸，广州风气早开，对“西学”反应迅捷，在新式女学事务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。由于传教士的活动较为自由，“教会所至，女塾接轨”^①，至1920年，广东一省就读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女生为7485人，居全国之冠，而省内自然以广州女生为最多。^②本地开明士女也不甘落后，晚清以来，广州绅商及家属联合海外华侨，或提供资财，或贡献心力，倡办、主事女学，“兴女学”之成绩放诸全国可圈可点。1907年初，学部《奏定女学堂章程》尚未颁行，但广东提学司发现“粤省风气渐开，私立女学，不下十余所”^③，可见广州士女兴学意识领先于官方制度建设，其办学成绩也居全国大城市前列。

在晚清广州投身于女学事务的女性中，最有名望者，据1904年《女子世界》的作者“翠微女士”所言，一为张竹君，一为杜清持（亦作清池、青持），“二氏之不避忌讳，破除积习，以提倡女学，固为吾粤女学界中铮铮占一席位者也”^④。张竹君早在庚子（1900）、辛丑（1901）间，即被广州士人目之为“妇女界之梁启超”^⑤，1902年又“改南福医院为小女学堂”^⑥，更加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清末民初女学生的日常体验与文学实践研究（1898—1919）”（项目编号：16CZW037）、“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”（项目编号：tsqn201909059）及山东省高等学校“青创科技计划”团队项目（项目编号：2020RWC004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 梁启超：《倡设女学堂启》，《时务报》第45册，1897年11月15日，第3页。

② 参见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，蔡咏春等译：《1901—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（修订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53页；乔素玲：《中国近代女学地域分布探析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第18卷第2辑，2003年6月，第115页。

③ 《封闭女学之牌示》，《中国日报》1907年2月20日，转引自李又宁、张玉法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（1842—1911）》，龙文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135页。

④ 翠微女士：《志士之对待女子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3期，1904年3月，第82页。

⑤ 冯自由：《女医师张竹君》，《大风》第43期，1939年7月15日，第1373页。

⑥ 马贵公（马君武）：《女士张竹君传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7号，1902年3月17日，第118页。冯自由《女医师张竹君》一文则将该校坐实为育贤女学。

为人推重。1904年，张竹君移居上海，继续投身于女子教育及卫生事业，其在近现代妇女史上的重要位置早已彰显。杜清持在1902年被誉为“贞德之返魂”“威拉之化身”^①，但相比今日学界对张竹君的研究，杜清持的经历模糊、形象黯淡。目前对杜氏的专论，仅有广东学者李兰萍在著作《辛亥革命与广东妇女》中以一小节的篇幅予以介绍。^②这种研究现状，主要原因在于史料搜集较难。清末民初对女子教育活动的报道，往往散见于报刊，零碎断续，不成系统，史料收获的偶然性极大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随机性。

在这一情形下，杜清持自述《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》（以下简称《回忆》）的发现可谓适逢其时。此文发表于《紫罗兰》杂志第4卷第11号的“妇女之乐园”栏目，1929年12月1日出版，署笔名“移风女士”。《紫罗兰》为现代文艺杂志，杜氏《回忆》又未用本名，难以被检索到，故迄今为止未有教育史家、妇女史家使用。《回忆》全文13页，共6105字（含标点及附注）。以其篇幅之长、材料之丰富、所记时间跨度之大、记事之详细，实是难得的教育史料，对杜清持的研究更是至为关键的材料，因此有及时披露、详加解析的必要。

据作者自言，当年秋天，侨寓上海的杜清持与诸侄一起聚居，时被缠着叙说旧事，而友人“梅璩先生”也以办学经过垂询，杜氏虽觉头绪纷繁，“正如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”，但依然娓娓道来，撰成此文。“梅璩”在《回忆》后缀以识语，称“移风女史为吾乡提倡女学之鼻祖”，此篇“固不必以文胜，而文亦自可诵”，转而将其“敬以献诸鹄公”。此处的“梅璩先生”为当时知名通俗小说家、海南籍文人王梅璩（梅璩为号，又号“梅癯”^③），“鹄公”指《紫罗兰》和《申报·自由谈》的主编周瘦鹃。王梅璩时为旅沪富绅杜纯（字梅叔，号了庵）的家庭教师，为其教授子女杜少梅、杜幼梅。^④杜纯与杜清持为兄妹（或姐弟）关系。^⑤大约在王梅璩的引荐下，杜清持逐渐加入以周瘦鹃为中心的上海通俗文学圈，于1929年在《紫罗兰》和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作品。纵览《回忆》全篇，杜清持显然是有备而为，将其作为一生办学活动的总结。

二 杜清持与移风女学校

在杜清持的办学生涯中，“移风女学校”是最早被报刊提及的女子学校。1902年10月，续出的《女报》第6期在“论说栏”刊发杜氏《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》（署“杜清池女史”），此文因被朱有璪的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收录而广为学者征引，成为近代女子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。不过，因为没有后续的跟踪报道，移风女学校办学情形无从知晓，甚至其是否真正开办过，也是存疑。可能正是基于此种考虑，当代的《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》《近代广州教育轨辙》《广州市志·教育志》《广东省志·教育志》等地方文献都未提及移风女学校。但是，如果参照杜清持自述，移风女学校有其真实存在的历史。

根据杜氏《回忆》，她有明确的“兴女学”之意识，是在戊戌之后：

① 裙钗真仆：《记杜女士演说事》，《（续出）女报》第8期，1902年11月30日，转引自唐欣玉：《重写典范：贞德在晚清》，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3年第4期。威拉即 Franeis Willard，今译威拉德。

② 参见李兰萍：《辛亥革命与广东妇女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63—165页。

③ 王秀明：《绛帐春风寿国花》，《申报》1928年12月12日，第21版。

④ 参见吴吉人：《哭梅璩师》，《申报》1931年5月14日，第11版。

⑤ 杜清持称杜幼梅为侄女。见移风女士：《夺天后之奇谈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5月26日，第21版。

自戊戌政变后，尝观《时事新报》《新闻丛报》诸书，痛时局之日变、女学之沉沦，毅然以所寓斗室，颜曰“移风女学校”。

很明显，杜清持创设女学的冲动，乃因国事激变和舆论宣传而生。可能由于时代久远的关系，她提到的报章名称有误：事实上，在1911年前并无“时事新报”“新闻丛报”之存在。基本可以确定，“新闻丛报”当为梁启超主笔的《新民丛报》之误。考虑到该杂志1902年才创刊，再辅之以前述《女报》和《大公报》的消息，可以确定移风女学校创办于1902年。

移风女学校的创设，可谓因陋就简，校址即设于杜宅。最早的学生，仅有其侄女杜友棠、杜景荫两名，后又增加潘姓、李姓、熊姓等学生。从《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》可知，“移风”校名之来由，乃是“取移易禁锢之脑筋，而首开改良之风气”的愿景，即改易男尊女卑、女子无识之陋俗，实现杜氏对女性“明大义、达时变”之期盼。^①虽然杜氏在序言中低调地称自己开设学校，是“自课余暇，转以课人”，但是很显然，她在校中的主要身份，并非学习者，而是师者。杜清持投身教育，以移风易俗自命，然其争取女权、挾伐旧习的激进主张，以及女学校在现实中的面世，都构成了对守旧势力的挑战，很自然地也遭到顽固者的抵制甚至是攻击。据杜清持回忆，“时人乃少见多怪，常用石子、秽物掷门”，甚至以谐音高呼学校为“麻风女学校”。杜清持认为这类人乃不可理喻之“妄人”，丝毫不为所动，继续办学。同时还为丈夫曹有成主持的报纸撰写稿件，为女学张目，鼓吹开办学会、举行演说之益。她的办学热情与舆论宣传，很快便得到回应，其中最值得期盼的，是与“兴女学”之同道的相遇，随即迅速促成“广东女学堂”的面世。

三 杜清持与“广东女学堂”

关于“广东女学堂”，此前最权威的说法来自黄炎培《清季各省兴学史》的记载。黄氏引录当事人汪千仞的回忆及其提供的《坤维女学校十二周年纪念录》，前者称“（龙）伯纯先生与（汪）千仞先生于（时敏学堂）讲学之暇，倡办广东女学堂”，后者言“吾粤之有女校，何自昉哉？前清光绪二十九、三十年间，桂省汪千仞君偕其夫人刘佩箴女士来游吾粤，与杜清持女士议立广东女学堂”^②。由今视之，前者抹去了杜氏、刘氏倡导者的功绩，后者则所记时间有误。以下详析。

据杜清持回忆，她在报纸发表的《论办女学当先开会演说》一文为时敏学堂监学龙志泽（字伯纯）、汪凤翔（字千仞）所见，二人非常敬佩，同来杜宅造访，约定每逢“星期假日”，以时敏学堂为开会地址，进行演说训练。演说会行至第三次，汪、龙二人与胡汉民、江天铎等当场主持募捐，“即席得数十金作临时试办费”，于是在城西多宝街租定屋宇，开办女学。此为“广东女学堂”的倡办经过，杜氏作为发起人的身份确凿无疑。此后其办学活动，亦顺理成章地由移风女学校转移至“广东女学堂”。

“广东女学堂”直接以省份冠名，这种方式在晚清女学中非常罕见。实际上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称谓。因为此前的移风女学校是家塾性质，“时吾全粤未有所谓女学者，故不必拟校名，只

^① 参见杜清池女史：《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》，《（续出）女报》第6期，1902年10月2日，转引自朱有珮主编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（第1辑下册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911页。

^② 参见黄炎培：《清季各省兴学史》，黄炎培著，中华职业教育社编：《黄炎培教育文集》（第2卷）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519—520页。

大书‘女学堂’三字榜诸门”，而报章在报道该校新闻时径称为“广东女学堂”。杜氏既为学堂发起人，同时也是首批教习之一，另一位教习刘佩箴（亦作佩珍，汪千仞妻）也兼发起人身份。

需要考辨的是“广东女学堂”的正式开办时间及所遭遇之阻力。前引黄炎培文将开办时间定于1903年、1904年间，温良仲《十年来广东教育之回顾》（1921年）也称“清光绪三十年，刘佩箴、杜清持两女士议立广东女学堂”^①。不过，若根据1902年《申报》的消息，该校成立时间则可提前：

广东访事人云：省城倡设时敏女学堂，现议将多宝大街时敏书局暂并入时敏学堂，即以书局为女学，专聘杜清池、刘佩珍[箴]二女史为教习，定期九月十五日开学。^②

由校址、教习姓名不难看出，“访事人”口中的“时敏女学堂”，即是杜氏回忆中的“广东女学堂”，开校的具体时间对应的公历日期为1902年10月16日。考虑到新闻刊出日期与内容本身的时间差，再结合1904年初两广学务处称其“开办既已年余”^③的历史，则“广东女学堂”如期开学应是定局。

按照惯例，“广东女学堂”开校时，当发柬邀请广州乃至周边府县地方官员、学界要人出席典礼。然而“广东女学堂”之诞生，既遭到了“野蛮之辈”的阻挠，也让守旧的官长、学绅大为不满。1903年初出版的《新民丛报》，即绘声绘色地刊录了南海知县裴景福、两广大学堂监督丁仁长与他人的私密通信。丁仁长在寄往惠潮嘉道秦炳直的信中说：“初闻有人倡女学。此何等事！未必真公然举行。乃昨日竟敢送帖来请，胆妄已极！”裴景福则答广州知府龚心湛函云：“倘不封闭，则恐中丞（注：指广东巡抚李兴锐）不答应。”这令《新民丛报》的编辑非常激愤，斥丁、裴二人为“狗彘”^④。远在上海的柳亚子，1904年也视之为禁阻女学的“鰕生狗曲”^⑤。考虑到1904年初出台的“癸卯学制”对女学堂之合法地位的否定^⑥，以及1907年之前各地不时发生的查禁女学的事例^⑦，则广东守旧官员、士人对女学堂的阻禁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“广东女学堂”开办之初，由于不收学费，“来学者数十人”，可见其并未被顽固者所阻断。1903年5月出版的《女学报》在卷首刊出女学堂全体人员合影，师生共计27人，可见“广东女学堂”发展之迅速。对稚嫩的“广东女学堂”来说，最严重的打击来自两广学务处的斥责。杜清持《回忆》称，学务处的批词内有“汪、曹等竟纵容妻子作此等不正行为”之语，大有查封之势。两广学务处为总督岑春煊稟请设立，1903年11月10始启用关防，由岑氏委派张鸣岐兼

① 温良仲：《十年来广东教育之回顾》，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：《近代广州教育轨辙》，广州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32页。

② 《创设女学》，《申报》1902年11月8日，第2版。

③ 《批女学稟》，《华字日报》1904年1月19日，转引自李兰萍：《辛亥革命与广东妇女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78页。

④ 《教育时评：广东女学堂事件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25期，1903年2月，第71页。

⑤ 亚卢（柳亚子）：《哀女界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9期，1904年9月，第4页。

⑥ 参见黄湘金：《“癸卯学制”与晚清女子教育》，《苏州大学学报》（教育科学版）2015年第1期。

⑦ 参见柳亚子：《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》，《复报》第5期，1906年10月，第26—28页；《吕碧城女士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》，《教育杂志》（天津）第2年第21期，1907年1月，第4—5页。

管。^①在媒体最早于1904年1月19日批露的两广学务处的批文中，并无上述文辞，但可注意者有二：一是杜清持不堪教习之任，“如果欲保全而扩充此女学，不得不先易杜清持”；二是女学堂应学习家政，“今该学堂欲兴女学，乃不列家事一科，虽有国文、修身、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卫生各科，仍是空言，并无实践”。^②学务处对家事一科的计较，乃是秉承“癸卯学制”的旨趣，从蒙学、女学须有裨女性将来家庭身份的现实目标来考量。^③至于其务去杜清持而后快，显然是因为此前杜氏的张扬作风招致学务官员的忌讳。

检索杜氏在晚清报刊登载的诗文和演说稿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1901—1903年间，她是以“杜清池”（或“清池女史”）的名字发表；1904年之后，则基本改用“杜清持”的署名。相较而言，以杜清池的名义面世的文字要激进得多。综览杜氏于1904年之前在《清议报》、《女报》（《女学报》）、《中国日报》发表的篇什，其主题不离“男女平权”4字，时见勇于赴任、不畏牺牲的悲壮情怀。1901年刊载于《清议报》的文章称：“故中国欲振兴，必男女平权、各求自立而后可。”^④同年在《清议报》以诗答“亚洲诗三郎”时自言：“中原不乏奇女子，谁唱平权痼习更？他日自由跨欧美，全球还我大文明。”^⑤这种公开化、社会化的文字展演，再加上她平时不时聚众进行演说训练的做派，都在受众面前塑造出一个典型的“英雌”^⑥形象，这不仅为她在女界中赢得了“巾帼卢骚”“女长沙”^⑦的美名，也令一般民众（当然更包括守旧官绅）所侧目。

杜清持在《回忆》中将此次两广学务处的批斥视为“千钧一发”之时刻、“校中第一次大风潮”。而“广东女学堂”的一线生机，端赖本地开明官员、广州知府龚心湛（字仙舟）的出面转圜。杜氏称他为“最开通、最肯提倡女学之人”，汪、龙校董精心撰写了禀文，龚“转达上游，并亲示护照，命张门首，飭警保护”。不仅女学堂能维持开办，杜清持也可以留任，继续主持教务。女学堂的转危为安，证明在1907年《奏定女学堂章程》颁布之前地方官员对女学事务的重要性，其与教育行政、地方士绅的角力或合力，决定了一地女学堂的命运。自然，对“广东女学堂”而言，继续开办也意味着教育思想乃至学科设置的调整。

1904年初修订的“广东女学堂”章程，可以视为各方力量协调后的结果。考虑到两广学务处此前的尖锐批评，可以看出校方的不少变通，章程第一条即宣布：“宗旨：以育德为主，而育智、育体以辅之，专求实学，为女子立身及他日相夫教子之本。”而在课程设置上，章程规定：“（程度较深者）分授修身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算学、卫生各科，其他女红，亦以时习，由教习另编有课程表。”^⑧其宗旨与日后学部颁发的《奏定女学堂章程》之贤母良妻的旨趣可谓不谋而合，而“女红”一科的加入，大体应合了学务处对“家事科”的看重。

值得关注的是“广东女学堂”获得官方给予的生存权利之后的表现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杜清

① 参见《两广学务处详报开办情形公文》，《四川官报》第5册，1904年4月，第4—5页。

② 参见《批女学禀》，《华字日报》1904年1月19日，转引自李兰萍：《辛亥革命与广东妇女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78页。

③ 参见黄湘金：《从“江湖之远”到“庙堂之高”——下田歌子〈家政学〉在中国》，《山西师大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第5期。

④ 清池女史来稿：《女子亟宜自立论》，《清议报》第76期，1901年4月19日，第14—15页。

⑤ 清池女史：《答（亚洲诗三郎）》，《清议报》第81期，1901年6月7日，第2页。

⑥ 关于晚清的“英雌”思潮，可参夏晓虹：《“英雌女杰勤揣摩”——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》，《文艺研究》1995年第6期。

⑦ 阳湖吴幼萱草：《赠杜清池女史》，《大陆报》第3期，1903年2月7日，第3页。“长沙”指贾谊。

⑧ 《广东女学堂简要章程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4期，1904年4月，第59页。

持及学堂学生在媒体上的展演，并没有就此中止。1904年，上海《女子世界》杂志公布“女学调查部”的首批3名“调查员”名单，杜清持位列其中。^①大体可以推断，在杜氏的引领之下，“广东女学堂”学生也加入了《女子世界》的作者队伍：当年该杂志第6期的封底所载之“寄稿家芳名录”名单，于杜清持之外，一口气开列张肩任、彭维省、彭维点、阮肃容、刘嘉慎、杨映福6位“广东女学堂”学生的姓名^②，而当年该校全体学生仅20人。^③其中，张肩任的表现尤为抢眼，文章涉及女学、女权、女性自立诸话题^④，而13岁女生彭维点论朝廷与国家之别，明显可以看到梁启超观点的影响。^⑤这充分表明，在女学堂的庇护下，年轻的女学生及时汲取新书新报之营养，并迅速转化为对社会、时事、自我的关注。其论调之大胆、思想之活跃、气质之健雅，远非“相夫教子”的学堂宗旨所能涵括。杜清持本人之笔名的改变似乎也意味着视野的更新：她当年在《女子世界》杂志发表的长篇演讲稿《男女都是一样》《文明的奴隶》既显示了对“天赋人权”新知的当下理解，更把话题转至放足、读书这些贴近学生受众的内容，展现了身为女教习的务实作风。当然，其中也隐约贯穿了对“女权”的呼吁，这是她内心并未完全消褪的坚持。^⑥至于女学堂这一实体，在不久之后，随着新的正式名称——“公益女学校”的诞生，作为过渡的“广东女学堂”便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1904年，“广东女学堂”师生的精神风貌与学堂章程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这种反差的背后，是女学堂面对外界高压约束时的应对和坚持。它在向今天学者展现晚清女学的现实生态的同时，也提示我们对彼时女子教育的考察，并不能停留于思想和制度的层面：相形之下，晚清女学的日常实践更真实、更具体、更生动，也需要更加贴近的考察。

四 公益、坤维女学校合分中的杜清持

关于公益女学校，今日教育史家多次征引的凭据，乃是《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》的记载：“私立公益女学创办于1902年，主办者为刘佩箴、马励芸、杜清持、张竹君”^⑦。这不仅把广州的女学先进混为一谈，也把该校的历史提前了。实际上，据杜氏《回忆》，公益女学校是杜清持、刘佩箴办学活动的自然沿续，直接承袭“广东女学堂”而来，是该校的正式定名。堪为证据的是，1918年出版的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刊登的该校最早学生合影“癸卯年公益女学校全堂拍照”，与1904年《女子世界》杂志上登载的“广东女学堂学生摄影”乃是同一张照片。

略需分析的是公益女学校的定名时间。杜氏《回忆》记为1904年，但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称“本校创办于前清光绪之癸卯”，即1903年。考虑到1904年7月学生还以“广东女学堂”的名义在《女子世界》杂志出现，则基本可以断定：公益女学校在1904年下学期，正式替代了“广东女学堂”的校名，原学董汪千仞将逢源西街的住宅转让，作为学校的新校址。

① 参见《担任调查员姓氏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4期，1904年4月，广告页。

② 核检晚清《女子世界》杂志的全部刊期，她们一共正式发表了8篇文章，其中张肩任3篇、彭维省2篇、彭维点2篇、阮肃容1篇，刘嘉慎和杨映福没有发表。

③ 参见《广东女学堂学生摄影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8期，1904年8月。

④ 参见夏晓虹：《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——〈女子世界〉研究》，夏晓虹编：《〈女子世界〉文选》，导读，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4—36页。

⑤ 参见十三龄女子彭维点：《论朝廷与国家之异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2期，1904年2月，第75页。

⑥ 参见夏晓虹：《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——〈女子世界〉研究》，夏晓虹编：《〈女子世界〉文选》，导读，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0—31页。

⑦ 曹思彬、林维熊、张至：《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74页。

杜清持《回忆》述，1905年春天，杜氏束装前往上海务本女学考察，学习治校经验，“俾得参考”，以便更好地管理公益女学校。公益校务，则由龙伯纯的族妹龙负责暂时代理。留沪期间，杜氏与上海女学界交往颇多。她得到了务本女学舍监葛尚平（创办人吴馨之妻，杜称为“校长”）的优待，可以专心“习日、英两国文字”。到沪两月之后，与罗迦陵、蔡元培结识，被邀担任爱国女校教员及舍监。杜清持在沪行踪，亦见于他人记载。长沙“贞林女史”程琼（程颂万姊）于上海游历时，参观务本女学，得晤杜清持。杜氏言有游学日本之计划，程琼对她的风采、志向十分钦佩。“清持之志愿远大，且将游日本，欲得其强国之宗旨，以归救中国，提倡女学，为吾巾幗吐气扬眉。惜予孱躯多病，不获同游，欣羨无已。”^①由于公益女学校不时“函电交驰”催促，杜清持于暑假时即返回广州，继续主持校务。

当年，刘佩箴因近亲去世，“家居守制”，汪、龙二人亦因事远游，公益女学校只能由杜清持独力维持。反对女学之人见杜氏势单力孤，再次对女学进行攻击，公益女学校遂陷入危局中，杜清持称之为“恐怖时代”，是自己掌校的“第二次之大风潮”。其时学生纷纷告退，杜清持毫不畏惧，置成败于身外，“惟立定方针，自信问心无愧，即使仅余一人，余亦照常办理，不改初心，断未有索然停办、转达彼反对者目的之理”。此次危机的安然度过，靠的是成立不久的邻校“述善学堂”校长黄诏平的及时援手，“令教员以义务出为助”^②，公益女学校声势方稍壮。

黄诏平不仅及时对公益女学校出手相助，自己也于1904年开始筹划新的女学堂，此校即为晚清广州知名的“坤维女学校”。黄诏平原为南洋侨商，财力雄厚，办学之初即捐银3000两，因而坤维女学可谓谋划宏远，规模宏阔。坤维女学校1906年获准立案开办，黄诏平任董事长，夫人马励芸担任学长（即校长）^③，并聘杜清持兼任监学。^④相较之下，公益女学校“经费日形支绌[绌]，并无常款，岌岌可危”。杜清持在《回忆》中言：“至丙午岁（1906），得邑绅黄夫人马励芸女士之赞成，嘉余等之毅力，允为担任经费，且购地建筑校舍，大加扩充”，“由马女士更名曰‘坤维’。师生乃为‘公益’之蜕化，名目虽不同，人力精神如故也”。杜氏此处表述隐晦，这一校名变动之实质，是新成立的坤维女学校合并了公益女学校，取消了“公益”之名。合并之后的坤维女学校，马励芸任校长，杜清持、刘佩箴为监学。至1907年，坤维女学校有学生近百名，为当时广州规模最大的私立女学。^⑤对于被合并之事，民初的公益女子师范学校着眼于自家血统，将此一时期称为“本校附学时代”^⑥。

公益女学校并入坤维女学校之后，原有师生如何立足，杜氏并未明言，但1912年公益女学校再次分立，即表明合并后的人员相处并不融洽。据杜清持《回忆》，1912年暑假，“校中同事，适以意见不符辞席，而多数学子相从，于师生措资，密谋组织恢复‘公益’”。《广东公益女子师

① 长沙贞林女史程琼：《游历记》，《女子世界》第12期，1905年5月，第87页。

② 阿牧：《六十年广州社会稗史》之“女学潮”，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号》，1931年，第40页。

③ 刘嘉伟：《广州第一间女学——坤维女学创办经过》，广州市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荔湾文史选辑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28—132页。不过刘嘉伟记该校1905年开办，似有误。黄悦亨《广东省长公署省视学视察》载：“据校长称，该校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购地建筑。”（《广东教育公报》第7卷第6期，1919年12月，第10页）《坤维杂志发刊词》载：“我坤维学校，在民国纪元前六年诞生。”（《坤维》创刊号，1923年，第2页）后两说应更可信。

④ 参见《广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1918年。本文所用之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《坤维》及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号》由杨海龙博士代为复制，谨致谢意！

⑤ 参见《女学之现象》，《广益丛报》第5年第5期，1907年5月11日，第9页。

⑥ 参见《广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1918年。

范学校概要》称：“民国元年，坤维忽生暗潮，师生联翩散去。”公益女学校原教习郑颉侯、叶玉阶等人，从坤维女学校中辞出，联合旧同事筹措资金，重新续办“公益”，是为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”之由来。设校址于宝华乡约直街（次年迁多宝大街第七、第九号），时新旧师生有80余人，按照民初学制，将学生分为5个年级（预科1年，本科4年），是为公益之“续办时代”。^①杜清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推举为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校长。

公益女子师范学校的兴学宗旨为：“本校以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以养成女子，使出可为社会之中坚，人可为家庭之模范。”其语句秉承早年“广东女学堂”章程而来，内容的变化显示了时代移易后女学旨趣的调适。杜清持在就职之初，发表了长篇演说，拈出“不自由”3字，定为治校之理念。她在演讲中大谈自由与法制、纪律的辩证关系，认为自由与任性有天渊之别，求学的最高境界即是孔子所云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：

自由乃毋庸讲、毋庸争者。苟学问有成，则自由不期然而然，不期至而至矣。盖我所行之事，均无失，人自不讥，此即我之自由。

为了加强演讲的说服力，杜清持还引用了晚清流行的罗兰夫人之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以及“自由自由，世间多少罪假汝之名而成”的名言，以征放任自由之恶果。杜氏演讲放在1912年，有若老生常谈，较之于10年前的高唱女权的“英雌”形象，其思想光焰似乎晦暗很多。不过，这种趋于平实乃至保守的治校理念，应置于当年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：它是杜氏主持女学历经多次风波之后的自我调适，亦可视为对民国元年趋于浮躁、终无所获的女子参政运动的教训之反思。^②当然，它首先即是朴素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针。

执掌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期间，最令杜清持难忘的，是1915年“乙卯大水”^③中的遭遇。当年夏天，广州淫雨成灾，杜氏与学监及多名外省学生困于学校楼中数日，粮食紧缺，后幸获同街一学生家长（米商）之援助而得以度过艰危。大水多日不退，周边建筑又发生火灾，多年后杜清池回忆起来“犹慄慄”。身为校长的杜氏强作镇定，度日如年中犹作乐歌教与学生排遣忧惧。从《回忆》所录的两首“洪水歌”，可见当日“水火交攻”之苦况以及师生苦中作乐的精神风貌：

乙卯大水与学生蛰伏危楼，教此消遣

风雨处危楼，况复洪涛刚浸后。形式虽似仍如旧，基址已松浮。愿共筹治河政策毋庸后。及早图补救，幸勿迁延秋复秋。

未雨宜绸缪，补牢尚欲善其后。身家性命谁不有？并非越俎筹。开河宣泄潦水流无停逗。基围速固修，标本兼治效方奏。

洪水歌

天灾流行，水火兼至，何辜我粤斯民！治河数载，均无善法，应当各自为生。

^① 参见《广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1918年。

^② 关于民初女性以争选取权为中心的参政运动之结过及结局，可参李细珠：《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——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4期。

^③ 关于“乙卯大水”之情形，可参吴智文、李颖亚、曾俊良：《广州百年灾难史话》，广州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9—41页。

危楼独处，风雨飘摇，惨闻救命呼号。水势汹汹，日见加涨，况复待哺嗷嗷。

忧心忡忡，何时或释？呜呜彻耳警笛。省城如此，况复乡中！流离失所者众。（副歌）各宜自立，发奋为雄。天理良心，一秉至公。

杜清持在《回忆》中收录多首自己创作的学堂乐歌。除了前引2首作品外，另有《女学生歌》《学问助我歌》《音乐歌》《读书乐歌》《实地练习歌》《秋兴歌》《及时求学歌》《中秋歌》《多阅报纸歌》《急进学校歌》10首。按照夏晓虹对近代女学堂乐歌的区分，它们属于励志歌、助学歌与时事歌3类。^①《回忆》中未见曲谱，仅就歌词上而言，它们大多篇幅较长，压韵较自由，多用短句，风格轻松活泼。“何以娱情？有暇辄把歌来谱。”（《音乐歌》）在日常教学中，杜清持对学堂乐歌抱有浓厚且持续的兴趣，这批作品可视为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重要材料。

根据林熙的回忆，公益女子师范学校在民初尚办有男女兼招之附属小学，校长为杜清持。^②高伯雨亦在回忆录中提及1913年自己在公益附小就读之事，他的母亲当年因为学校在孔子诞日演“白话剧”少给高家门票而与杜清持发生争执，甚至在一气之下命高氏姐弟数人从学校退学。^③这种有趣的记载，表明了杜清持掌校时对学生文艺演出的重视，与其对学堂乐歌的热爱一脉相承。

小 结

1918年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出版之时，杜清持依然担任该校校长。不过“乙卯大水”之后，杜氏在上海大病，年底始愈，承母命不能返广州，数年间她只是“遥领校长”而已。1918年后，她曾恳请夏桂徵（夏同龢侄女、秘鲁领事何伟兰妻）暂时代理校务。后夏氏病重住院，杜清持则推举首届师范毕业生曾孝敏^④接替校长之职。维持数年后，该校终因经费支绌而停办，杜氏毕生之办学业绩遂成为历史。

1929年，杜清持以“移风女史”和“移风女士”之笔名撰写《回忆》，并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笔记多则^⑤，这似乎表明：以移风女学校开始的教育事业，是她一生精魂所系，是最值得回眸的奋斗岁月。相较之下，长篇回忆文章比短篇笔记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。作为杜氏教育生涯的全面总结，《回忆》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，它详细记载了杜清持本人先后主持（或参与）移风女学校、“广东女学堂”、公益女学校、坤维女学校、公益女子师范学校的经历，是近代广州女子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，值得地方史志学者和教育史家重视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 全

① 参见夏晓虹：《晚清女报中的乐歌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8年第2期。

② 参见林熙：《从〈张元济日记〉谈商务印书馆（一）》，《出版史料》第5辑，学林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41页。

③ 参见高伯雨：《听雨楼回想录》，《听雨楼随笔》（三），牛津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9页。

④ 杜清持《回忆》称“毕业生曾女士”，曾孝敏之名据《本校师范本科毕业生一览表》确定，《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概要》，1918年。

⑤ 参见移风女士：《夺天后之奇谈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5月26日，第21版；移风女士：《一薰一莸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6月21日，第19版；移风女史：《十二道轮回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7月12日，第21版；移风女史：《打倒孟兰盆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8月21日，第21版；移风女士：《萱堂日永记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8月27日，第18版；移风女士：《小诗话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9月29日，第19版；移风女史：《秋斋小话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11月21日，第17版。